



流寇之發展及其前途（二完）

陶希聖

一 游民革命集團轉變爲何物？

本刊第三卷第七號拙作流寇之發達及其前途一文，文意原沒有結局。迄至今日，才得暇續成。

如前所述，游民無產者是沒有確定利益的。他們與農民一同蜂起，卻可以向商人地主投降。這種轉變，只有利於少數首領，使他們離背農民無產者，以商人地主政府領袖而成功。

很顯然的，游民轉變爲何種勢力，這不決定於游民的性質，而決定於收買和誘引游民的勢力。因爲游民本身沒有確定的利益。並且，游民集團的轉變，並不是有利於全集團的游民，只有利於少數的首領。這兩層是必須明白指出，才可以了解過去歷史上革命的轉變過程的真實。

先說明游民無產者集團轉變而成的反農民無產者勢力，其性質是依當時存在的反農民無產者的社會階級的性質這一層。

社會是不斷變遷的。發生時期互不相同的兩個以上的社會現象，其形式與內容決不會同一。牠們各受當時的社會經濟構造及決定此構造的生產交換方法的決定。以例來說：在秦漢之交，商業經濟的發達尙在幼稚時期，長江以南還「火耕而水耨」，還沒有施用深耕方法；山東一地卻已有較爲發達的手工業（紡織業），以致農地生產以紡織原料（桑麻）爲大宗；河南山西還有大農場與分散農場並立，奴隸及大農場所有主尙有相當勢力，存在於小農民小地主之間；陝西平原已有小農經濟的普遍存在，其生產性較以外各地爲優；在這一時期（公元前二一〇至二〇〇年即秦末

漢初)游民無產者的少數首領，只有結合破落的奴隸所有主(如張良)，只有保護新興的小地主(如約法三章，禁止盜罪)，只有聽從鄉紳的勸告，表示自己尊重社會名分，

——表示自己並沒有破壞現存財產制度及由此所生的名分關係的意思(如聽從三老董公之勸告，為義帝發喪而後攻項羽)，才可以得到反貴族的新興地主的同情。劉邦捨棄農民的立場，服從商業地主經濟的社會的指示，才可達於成功。而成功之後，他們這一集團的百幾十個首領，便劃地收稅，同時在稅收區域之內私有耕地。這種占有耕地及分收地稅的諸侯王列侯制度，乃是適應當時各地生產方法極度參差，而佃農與小自耕農、地主、農奴所有人，奴隸所有人，並存的狀況的。

後一千五百多年(一三六〇年左右)，革命中的游民叛變，卻有全不相同的實際。這一時期，已經是大手工業的階段。大商人每有獨立的手工業者幾千乃至萬家在他支配之下。又承元朝開通中國與西亞細亞交通之際，商業資本得到異常的發達。於是大地主大商人階級所造成的破產農民手工工人及貧農，蜂起反抗蒙古的統治。在這一表面為民族運動而實際為反商人地主運動之中，手工工人及農民蜂起的對象，自然是地主商人及其所保持的私有財產制

度。元的政府是崩潰了的。商人地主的反攻及自保，成了明瞭的事實。各處有聚眾保營的富翁，各處有反對農民無產者的士子。蜂起的各個集團，因此中分為兩大壁壘，其一是與商人地主決戰的。其一是變而保護富豪並收羅士子的。聚眾保營的勢力當然選擇後者引為友軍。友軍的首領朱元璋竟憑藉他們以取政權。成功之後，依於高度發達的商業經濟，他與劉邦只建設鬆懈相依的諸侯王政治不同，竟建立超越前代的中央集權政治。

只依上列兩例，已可知游民集團轉變為何物，不是游民性質或游民首領的意思可以決定的。決定轉變的歸趨的，即是誘引轉變的勢力。故革命轉變的實際，乃是革命中兩個對立的社會階級勢力的權衡。在表面我們看見勝利者是原舊的農民無產者首領，在實際卻不過反農民無產者的商人地主的成功。成功以後的政治經濟組織，當然依據當時商人地主的要求。這是超越游民首領的意思的。游民首領只不過利用以滿足自己的利益。

二 因革命轉變而受益者何人？

游民革命集團轉變為反農民無產者的勢力，只不過有利於少數首領。所以游民無產者集團的轉變，並不是全團員

的轉變，乃是集團的上層的轉變。游民無產者集團的上層，將要轉變時，必已有官僚化及反動化的傾向或事實。劉邦、竇建德、朱元璋的首領階層，在拋棄農民無產者羣衆之先，已有反於羣衆的傾向（如由輕蔑私有制與士大夫漸變而尊重私有制與士大夫）。

凡上層沒有官僚化的傾向及反動化的意識之游民集團，決沒有轉變的事的。其實例如西漢末的赤眉、更始等軍隊，始終保持他們蜂起當初的原狀，與「威儀赫赫」的地主軍隊，形成對立的形勢。所以劉秀集團不能夠挾帶更始赤眉以建立地主政權，而必須脫離更始，以漁陽上谷的騎士爲主力。歷代以來，每次舊政權顛覆的時機，被突起的地主軍隊擊敗的農民無產者軍隊，大抵是上層還沒有官僚化反動化的。

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國，其末年雖然有容許儒家思想的表示，雖然有腐朽的萌芽，卻始終保持農民無產者的消費的社會主義的政策。我在別處屢次說過，倘若洪天王早些轉變爲地主勢力，則左彭胡難保不成他的開國元勳。惟其是他們始終堅持蜂起當初的政策，才與地主商人勢力之左彭胡對壘。

在別處我又曾指出：太平天國開中國革命史最新的紀元

。因爲牠是不曾轉變爲商人地主而被商人地主打敗的。太平天國所以有對社會主義堅持的態度，這是由於中國當時已有資本主義生產開始發達的趨勢，因此已有與資本主義生產相隨而生的社會主義血脈。

這種血脈——現代生產勞動的無產者，在一九二五年的中國革命，表現其百倍於太平天國時代的勢力。這一回革命帶有充分的現代革命的色彩。這一回革命有社會革命的內包，有以集中生產爲基礎的社會主義即民生主義的容積。社會之構成既與前代不同，革命的發展當然也不同於前代。

由太平天國發展到一九二五年，把前代中國革命，變爲現代的革命。因此而前代的游民集團上層官僚化到反動化的企圖，不能容易成功。因此而前代革命後商人地主坐收成果的專制王朝，斷不能再現於現代的中國而獲得最後的成功。

資本主義生產把古代游民無產者化爲現代勞動無產者。牠把古代的原始社會主義，化爲現代以生產集中爲基礎的社會主義（即民生主義）。然而今日中國游民無產者的數量仍不減於前代。游民無產者在革命中所表現的影響仍然不可以忽視。

因資本主義生產制的發達，中國農業經濟破壞的趨勢，十倍於古來，且有不易挽回的形勢。同時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達，恰正當各國資本主義不能夠統制社會，不能夠自救衰頹的時期。各國失業業問題脅迫牠們的統治者，中國的無業和失業問題也是不易單獨解決的。由此而游民無產者的數量不減於前代，更有加多。

倘若我們看得出游民無產者，一方面有社會主義的意識（如太平天國），他方面又易為少數首領所乘而轉變為反農民無產者的勢力，我們對於大量游民應當多加注意。他們可以參加革命，也可以隨和反革命，只看領導他們的勢力是誰。

三 指出實際之理由

但是，指出游民無產者的動搖不確定的性質——一方面含有社會主義（消費的）的傾向，他方面又是「絕對貪污絕對銅臭」的，這是最容易引起指摘的一件事。這種解剖和分析是必要的，然而現在的黨派斷不容我們輕易說出。

有人一定說，反對多量游民無產者構成的所謂紅軍，這是地主的說法。然而本文的作者對地主士大夫從來沒有好評。說「流氓」是革命，當然為一方面所不喜。說「革命」是

流氓，當然受他方面所指斥。如實的說：游民領導的游民勢力，在破壞舊政權時何嘗不是革命。在建設新政權的時候，却有反革命的充分的可能。利用游民勢力，當然流為反革命。

這問題，為了革命的前途，必須要討論的。然而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。最大原因第一是以商人地主的立場，即蔑視這一勢力；第二是與此相反的，以游民的立場，即反對別人指出這一勢力的本質。探求真實是如此困難的。

十九年八月三十日上海

這文被排以後，看見動力第一卷第二期（上海神州國光社代售）

首篇即對我流氓之發展及其前途前篇加以批評，指為支配階級的論說。動力批評此文為支配階級的意識，是當然的，然而前篇沒有何種結論，有如批評者所推測，詳言之，在前篇，我只說中國從前屢次有游民革命集團轉變為剝削者的事實，並沒有說現代中國除游民以外沒有無產者，因此沒有社會革命的可能。我曾說過太平天國因沒有集中的生產基礎而失敗，並沒有說現代中國沒有集中的生產。我只說十六世紀初期德國游民之描寫，好像是描寫中國的，並沒有說中國今日與十六世紀初期德國在社會發達上是同一階段。以中國今日游民之多，是不是與三十年戰爭時代相類似，本篇既已排出，則此種批評不用再作專篇答覆，故只注數語於此。

十月九日

